

女性的发现

——郑观应、周作人女性观之比较

戴 勇

(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 江西南昌 330032)

摘要: 晚清文化先驱对女性的关注动力始于其浓厚的国家功利主义思想, 而五四学者对女性的关注更多体现出其浓厚的西方科学人文色彩。郑观应和周作人是晚清和五四时期对女性关注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 对比他们对女性身体权、女性生命权及女性教育等方面的态度, 可见看出女性解放在晚清至五四时期由功利被动到人文自觉的变化痕迹。

关键词: 郑观应; 周作人; 女性身体观; 女性生命观; 女性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38(2014)02-0111-04

Founding of Women

——Comparison of Zheng Guan-ying and Zhou Zuoren's Views of Women

DAI Yong

(Chinese Department,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2,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the dynamic of pione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ncerning about women began from their strong national utilitarian thinking, while the focus of the May 4th scholars on women more reflected the western science human color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in the two periods are Zheng Guan-ying and Zhou Zuoren, from whose attitudes to women's body rights, life rights and educational rights one can find the culture traces from utility passive to human consciousness in women's liberation.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Zhou Zuoren; women body view; women life view; women educational view

晚清时期女性群体受到关注的动力源自于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建构富强民族国家的宏伟理想, 他们实现理想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即是“兴女学”运动。在“兴女学”运动中, 女性个体的身份及价值地位得到了重新的审视与确立。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对女性价值及作用的重视始终是与民族国家的振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相较而言,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运动则与此表现不同, 五四学者关注女性的动力更多的是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 此时期女性的发现才真正由国家功利主义还原到对女性独立个体的关注。从晚清至五四, 女性解放运动走过了一条由被动到自觉发展的道路。所谓被动, 指的是女性解放被放置在国家民族振兴的宏大文化背景中, 女性解放受到的

功利色彩浓厚。所谓自觉, 指的是女性解放真正聚焦到女性的个体, 是为了促进女性个体全面发展的。对比晚清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郑观应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推动者周作人的女性观, 恰好体现了女性关注从被动到自觉的发展趋势。

一、女性身体观

女性身体的解放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内核。如众所知, 在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 古代女性的种种权利严重遭受男权的挤压和遮蔽, 特别是到了宋明以后, 理学的盛行更使得女性的解放雪上加霜, 至晚清, 女性的解放道路则尤其显得任重道远。

收稿日期: 2014-02-22

作者简介: 戴 勇(1980—), 男, 江西德安人, 讲师, 博士生, 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晚期公共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关注始于对女性身份的重新审视上,而废缠足则成为当时女性身体解放的主题。据史料记载,裹足之风,始于南唐后主的宫嫔盲娘,初流行于上层社会,后在坊间逐渐开始大肆追捧,一时成为中国古代女性的必备功课。尽管裹足对妇女的身体伤害重重,但古代妇女仍然乐此不疲并“快乐”的承受着这非人之殇。郑观应秉承的是科学的态度来反对裹足的,他认为:“裹足则残其肢体,束其筋骸,伤赋质之全,失慈幼之道。”^{[1](P164)}裹足者“生子女则每形孱弱,操井臼则倍觉勤劳,难期作健之贤,徒属诲淫之具。极其流弊,难罄形容。”^{[1](P164)}对于裹足者导致的流弊,郑观应说得十分透彻了。除此以外,郑观应还从基因遗传的角度痛陈裹足之弊。他说:“况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万事隳矣!夫裹足为贱者之服,岂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属耶?予所以言之喋喋者,实有系于天下苍生,非仅考订其源流而已。”^{[2](P34)}姑且不论郑观应所言裹足女性所生男女必柔弱的结论是否具备科学性,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从哺育的角度来看一个健康的母亲显然是要比裹足的母亲能更好的养育婴儿的。

关于裹足,周作人谈论也是很多的。在《拜脚商兑》一文,周作人称:“事实上中国人仍不得不暂时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的拜脚——而且是拜毁伤过的脚的民族。我自己虽不拜大小各脚,少数的教授学生们也不拜之,而‘文明女学士’尤‘高其裙革其履’了,然而若科学的统计不能明示缠足女子的总数如何锐减,我们即一日不能免此恶名。”^{[3](P178)}在《天足》一文,周作人更是直言“我嫌恶缠足”“以身殉丑观的缠足终是野蛮”“我喜欢天足”。^{[3](P174)}对于裹足在古代盛行的内在原因,周作人如是说:“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对于提鸟笼的人反感,也是出于同一的源流。如要吃肉,便吃吧;……如要鉴赏,在他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4](P19)}周作人揭示出正是因为因为在男权社会男性的变态残忍性心理的作祟,才使得这种陋习风行,有学者也指出这是其一大贡献。^{[5](P81)}

从郑观应、周作人对于女性缠足的态度可以看出,郑观应是站在女性健康繁衍后代的角度反对缠足的,而周作人不仅是从健康角度,还更多的是从文

化的角度来揭示缠足之风兴盛的原因。周作人揭示出了古代裹脚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男权社会中男子的变态性心理。

二、女性生命观

男女平等是女性解放的核心命题,要做到男女平等,首先要重新确立女性的价值和地位。在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思想盛行的古代,女性的生命和自由受到严酷的打压,女性在生存权、性、人格等方面是与男性完全不对等的。

郑观应主要关注的是女性的生命权。在《劝戒溺女》篇中,郑严词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民众却又视若无睹的溺女之风。郑观应指出溺女现象出现的缘由是“或以为生女太多,忿而溺之;或以为生女需乳,不利速孕,急而溺之;或婢女所生,妻不能容,迫而溺之;或偷生诚恐露丑,恶而溺之”。^{[1](P36)}尽管人们溺女有这样那样的借口,但集中一点就是对生命尤其是对女性生命的漠视。反观郑观应所言“殊不知皆父精母血妙合而成,有此女未必遂贫,无此女未必致富”。^{[1](P36)}郑观应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溢于言表。至于如何杜绝溺女现象,郑观应建议“凡溺女者以故杀子孙论”。^{[1](P37)}要用严酷的法律约束人们溺女。除此以外,另设育婴堂以收养婴赤,在乡村设善会,“凡地方贫户生女,力不能留养者,准到局报明。每月给白米一斗,钱二百文,以半年为度。半年之后,或自养或抱送,听其自便。实则半年之后,小孩已能嬉笑,非特不忍溺,亦必不忍送堂矣”。^{[1](P38)}从郑观应对于杜绝溺女所采取的措施来看,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因为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处理方法在当时晚清的政治语境中实施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不过尽管如此,郑观应对女性生命的尊重充分显示出了其进步的人文思想。

如果说郑观应是从敬畏生命的单一视角来捍卫女性生命权的话,那么周作人则从女性的独立人格及性权利上来捍卫女性的权益。

首先周作人坦言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子是没有独立的人格。在《尊重女子的中国》文中,周作人针对范定九在美国妇女集会上的讲演《女子在中国的地位》提出质疑,“实际上中国的女子还未被承认有人格的存在,就家庭社会各方面都有事实足以证明,吾人苟非故意颠倒黑白,就不能不亦并不敢不承认这句断语了”。^[6]中国社会女子没有独立人格的外在表现即溺婴、缠足、人口买卖以及种种家暴等社会现象

的存在。

其次,周作人还从性的角度阐述女性遭遇的种种不公。在《谈龙集·上海气》一文中,他说:“所以由上海气的人们看来,女人是娱乐的器具,而女根是丑恶不祥的东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在女子则又称为污辱的供献。关于性的迷信极其所谓道德都是传统的,所以一切新的性知识道德以至新的女性无不是他们嘲笑之。”^{[7](P74)}这里的上海文化按照周作人的说法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7](P73)}此文化的形成源自于上海殖民文化与传统文化杂交的结果,尽管沾染些洋味,但实在是“反穿马褂的道学家”,^{[7](P74)}在他们的眼里女性在性道德上所遭受的扭曲可见一斑。

至于在性犯罪方面,男女双方所遭受的评价又是天壤之别。周作人总结并列举了《情波记》派的信条,“假如男女有了关系,这都是女的不好,男的是分所当然的,因为现社会许可男子如是,而女子则古云‘倾城倾国’,又曰‘祸水’。倘若后来女子厌弃了他,他可以发表二人间的秘密,恫吓她逼她回来,因为夫为妻纲,而且女子既失了贞当然应受社会的侮辱,连使她失贞的也当然在内”。^{[8](P332)}周作人认为这是“十足的道学气”,^{[8](P332)}是“卑劣的道学根性”。^{[8](P333)}

对比郑观应和周作人在女性不平等权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见出郑观应只是从生命的平等权上为女性的不公呐喊,而周作人显然走的更远,周作人不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劣根性上来探寻女性受歧视所产生的原因,而且还把中国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放置在世界的文化语境中,进一步找出其内在的民族劣根性。

三、女性教育观

教育权是女性解放的又一重要内容。在“女子无才便是德”传统思想作祟下,古代女子的教育仅仅只限于刺绣女红之类的小技,至于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对于女性而言犹如痴人说梦。晚清时期女学的兴盛与晚清颓败羸弱的政治格局不无关联,郑观应在女子教育问题认识的出发点即在于此。那么为什么女学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呢?郑观应认为女学关乎着下一代的培育,而国家的兴亡取决于青年的成长,又因为母亲是孩童教育的开端,母教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孩童蒙养的成败。所以“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

始。推女学之源,国家之兴衰存亡系焉”。^{[9](P264)}

郑观应还进一步对比了父母两性在家庭教育中角色的轻重,其认为母亲的角色要重要于父亲,因为“襁褓之婴,孩提之童,亲母之日多,亲父之日少;亲母之性多,亲父之性少。由六七岁有知识,以迄十二三岁,天性未漓,私欲未开,母教之如种花莳果,灌溉栽培,先养其根本。教子女亦然,凡衣服、饮食、嬉戏、步趋,皆母得而引导焉、指授焉、勉励焉、节制焉。”所以“使母之教而善,则其成立也易;母之教而不善,则其子之成立也难”。^{[9](P264)}郑观应很是欣赏梁卓如的《论女学》,无独有偶,梁卓如也是重视母教的,其言“蒙养之本,必自母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9](P269)}不过与郑观应不同的是,梁卓如是从种族的进化理论来强调妇学的重要性,其言“教男子居其半,教夫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导原亦出于夫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9](P269)}正是因为妇学的重要性,所以梁卓如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学始”。^{[9](P288)}反言之,欲天下强盛,必自妇学始。

郑观应看到了女学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进步。至于如何兴女学,郑观应建议应“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富者出资,贫者就学,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奖其勤而惩其惰。美而贤者,官吏妥为择配,以示褒嘉。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整齐严肃。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织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愚贱皆知礼义,教化具有本原。此文、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2](P32)}

应该说郑观应对兴女学所采取的建议和措施是很有针对性的,其看到了西方女学文化带来的诸多好处,因此要效法泰西增设女塾。不过对于女学教材的内容选择及女学的培养目标上,郑观应还是没有脱离其儒教正统思想的窠臼。我们看到郑观应建议设置的女教内容不乏一些训诫女子之类的书籍,不仅如此,郑观应希图达到的女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三从四德相子佐夫的贤妻良母。显而易见,郑观应的出发点依旧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当时男权当道的社会统治,这对于其言是个不小的局限。

反观周作人对于女性教育培养目标的建议,显得更具科学性和人文性。对于女性教育的认识周作人说的很是谦虚,“我并不是学教育的,也不曾熟知

中国女子,因此我不能以什么教育家或是丈夫的资格来陈述她们的缺点,提议教育上的补救方法。我只是以旁观的地位,就见闻所得,说一句老实话,觉得现代女子确实有一个缺点,即缺乏知识之实用”。^{[3](P357)}周作人立论的背景是当时围绕着女子教育问题出现了两派主张,即女学生专做鸡蛋糕派和不作鸡蛋糕派。做鸡蛋糕显然是个形象的表述,其内涵是类似家务活之类的实用性技能。周作人坦言自己是赞成女学生做鸡蛋糕派的,换句话说就是赞成女学生要学会安身立命的独立生活的本领。然而事实上这些新女性“对于人生这一个大鸡蛋糕她们也同老姑母一样的没有办法”。^{[3](P357)}周作人对于女性教育的实用性可以说是看的很是透彻的,女性的独立首先要做到经济的独立,而学会安身立命的本领对于她们而言就显得尤其迫切。

除了实用性之外,人文性是周作人女子教育观的另一特点。周作人认为在当时男子就业都成问题的年代,女子要从男子手中分得一杯羹困难尤其深重。所以“老实说,现在女子求教育,不可从职业着想,如作为装饰看,倒还不错。列为不要以为这里含有什么讽刺,实在是如字说的老实话,至于因为老实而稍似唐突,或亦难免。所谓装饰,不必将学位证书装框高悬,或如世间所说,大学文凭可作嫁妆的一部分,其实只是凭了学问与教养的力,使姿态与品格自然增高,这是极好的精神上的装饰,在个人是值得用了十载寒窗的苦工去换了来的”。^{[3](P365)}女子教育不以职业为中心,一方面显示出周作人对于当时困难重重的女子就业问题的无奈,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其以

个人发展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在这里,女子教育不再受到诸如振兴民族国家之类的宏大目标的限制。女子教育仅仅是为了提升个人的教养,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来进行。

总之,郑观应和周作人在女性缠足、生命权、教育权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和建议,女性的价值和地位被得以重新确立和审视。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

郑观应的女性观仍然沾染了一些封建正统的儒教思想,因为郑观应的出发点是妇女解放能带来国家的繁荣与富强,郑观应功利主义式的女性观制约了其女性发现的视野。与其对比,周作人的女性观带有浓厚的西方人文色彩,周作人对女性发现的出发点是“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其真正是站在实现女性个体自由的立场上的。

参考文献:

- [1]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2] 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 [3] 舒芜.女性的发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 [4] 张明高,范桥.周作人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 [5] 舒芜.女性的发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 [6] 《京报副刊》第114号[N].1925-11-07.
- [7] 许志英.周作人早期散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 [8] 周作人.谈虎集[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
- [9] 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谢润根

(上接第110页)能让听众自己去创建整合作品的形象,而戏剧它直接为观众创造了可感的具体的形象。

另一方面,关汉卿的《窦娥冤》等公案剧使法制文学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元代社会黑暗,人民生活痛苦之中,渴望有一个祥和的社会环境,过上安定的生活。要过上太平生活,必须以法制来做保障,关剧直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这种心理。所以他的戏剧在当时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窦娥冤》、《蝴蝶梦》等剧至今还活跃在戏剧舞台上。从法制文学发展的视阈来重新审视《窦娥冤》,其崇高的历史地位更应当加以肯定。

参考文献:

- [1] 关汉卿.窦娥冤[A]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 [2] 江晓原.天学真原[A]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间[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 [3] 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 [4]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 [5] 张人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讲析(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郑晓茜